

作为一个外行人士简单说说从巴以分割到六日战争之后的（约1949-1970）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先从两个普遍错误认知开始。

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是因为两点：

1. 犹太人游说集团以及精英在美国的特殊影响力
2. 美国需要以色列作为代理人扰乱中东地区，从而使自己获利（主要是石油）

这两点看法很普遍，但大部分是错误的。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友好关系是在肯尼迪后期才逐步建立的。美国事实上在1963年之前都对以色列施加武器禁运。相反以色列的主要敌人：埃及，有着与美国相当好的外交关系和武器出口。反犹主义在过去整个西方一直都很有市场，直到六日战争（后面会提到）。以色列在肯尼迪时期之前的首要盟友是法国，因为法国需要以色列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充当遏制埃及的角色。相较之下，英美对于以色列以及犹太人依然是没有太强的好感的，这其中包括在美国的犹太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经常讨论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也是六日战争（_1967_）后兴起的。以及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各种犹太人的各种苦难，奥斯维辛之类的，也是在六日战争之后才成为了所谓的英语世界的主旋律。就像乔姆斯基说的：

“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们需要证明我们是对的。”

事实上肯尼迪上任一直到六日战争结束这段时期（_1961-1967_），是美国真正开始改变中东策略的阶段：从冷漠以色列转变成支持以色列。

六日战争前后，整个中东局势迎来了巨变：美国完全公开的支持以色列，以色列从经常被欺负的那个，变成了可以随便欺负别人的国家。六日战争的悬殊结果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羞辱。民众被激怒。阿拉伯国家从此起义内战不断。输出现代价值观的埃及的衰落使得沙特为首的伊斯兰保守势力愈发不可控制。进步主义在整个中东开始屈服于伊斯兰保守主义。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孤立无援，他们意识到现在凭借常规手段击败以色列已无可能。他们开始转向恐怖主义。这也是中东恐怖主义的开端。

所以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些背景：

美国对中东的介入起初是不情愿的。英国在二战后因为国力不济，打算大规模退出中东的殖民和事务。美国早已在30年代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极高层面的合作协议（沙特的石油储量远多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自身已经没有对石油的特别额外需求。但在冷战格局下，美国的接手是被迫的，因为要防止苏联获得这些资源。在二战后美国以及盟友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抵挡苏联势力渗透到中东的屏障：通过经济援助以及文化交流拉拢希腊-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因此在肯尼迪之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对于中东政策都类似过去英帝国的所谓“平衡与维持地区稳定”政策。对中东国家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使得他们可以在冷战中至少保持中立。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敌人们。在联合国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之后（_1947_），以色列面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极大威胁（主要是埃及）。巴勒斯坦西岸在第一次中东战争（_1949_）后就被约旦吞并，加沙地带则是被埃及。所以在当时的国际视角下，并不存在巴以冲突，而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在巴以分割到六日战争这段时间，阿拉伯国家的纸面实力远胜于以色列，而且此时以色列并没有超级大国的背书。阿拉伯国家相比以色列甚至与美国有着更好的外交关系。这两点原因使得阿拉伯国家一直奉行以消灭以色列为方针的外交策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当时过度强硬的态度也是以色列能在之后的外交上能获取更多筹码的原因。50年代埃及在苏伊士危机（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战胜了以色列以及背后的老殖民国家英国与法国，为当时的埃及强人纳赛尔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拥戴。美国这次站在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边。美国意识到埃及对冷战的重要性，美国希望进一步提高与埃及的友好关系以达到使阿拉伯世界远离苏联的渗透。苏伊士危机后，英法殖民势力加速退场，不结盟运动开始。纳赛尔的势力日渐高涨。在纳赛尔的支持下，伊拉克的王权政府被共和主义者颠覆。伊拉克王室在独立后一直有着和英国相当亲近的关系，这次政变的突然超出了英美的预料。美国开始对待埃及更加慎重。

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继续升级。中东逐渐形成了以埃及为首的世俗国家主义政权以及以沙特为首的传统伊斯兰王权政权对立的格局（也称中东冷战格局）。各种代理人革命甚至战争开始打响。美国此时的平衡政策变得举步维艰。沙特是美国的石油来源，两国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合作。埃及虽然更加难以控制，但埃及是一个更加现代以及健康的国家。文化艺术以及多样性工业都有显著发展，而沙特则是个以瓦哈比教派为主的神权国家。

肯尼迪时期：

在中东两级的影响下，也门战争打响：交战双方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王权政府和埃及支持的也门共和主义者。冷战时期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的流行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平衡政策难以维系。纳赛尔多次出售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来从苏联处换取武器。以及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在威胁沙特的稳定。外来者以色列毫无疑问一直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头号眼中钉。帮助巴勒斯坦赶走以色列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主旋律。肯尼迪此刻意识到美国此刻必须要在沙特和埃及之间选择一个。沙特对美国的重要性绝无可能替代。美国决定必须逐步放弃埃及。此刻以色列成了最好的，用来“制衡埃及”的棋子。

除此以外，肯尼迪个人对以色列的欣赏也影响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肯尼迪年轻的时候就认为以色列是现代建国的模范。以色列人的不屈以及锡安主义带来的宿命感使得肯尼迪对于以色列更有一种带有浪漫主义的好感。（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当时是弱势的一方）

1962年8月，肯尼迪取消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决定允许对以色列出售鹰式飞弹等系统，均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是美国以色列关系的转折点，也是阿拉伯-以色列对抗的转折点。

六日战争及影响：

1963月11月肯尼迪遇刺，但他对中东的政策得以延续。即位的约翰逊总统延续了肯尼迪的政策。埃及在此期间没有丝毫让步。得到先进武器的以色列也更加敢于面对与埃及的直接碰撞，一直到六日战争（_1967_）的爆发。六日战争，从名字就看得出，这是一个一边倒的战争。以色列以 1:20 的伤亡战胜了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军，还取得了所有的战略目标，一切仅仅用了六天的时间。战争细节这里掠过不谈。尽管的确有装备上的优势，但是以色列短时间的巨大胜利依旧不仅震惊了整个世界，甚至震惊了他们自己。以色列整个国家进入了举国狂欢。因为这场传奇战争，世界变得对以色列感兴趣。在美国的犹太人也开始加入这场狂热，苏联的犹太人纷纷开始移民到以色列。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世俗犹太人开始回归犹太教信仰。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再一次被加强。

六日战争发生在一个完美的节点上。美国正迎来社会运动的高峰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反战运动也掀起了犹太文化的复兴。美国犹太人与黑人成了各种民权运动的先锋。六日战争以最响亮的姿态被包装成了以色列人不断的抗争的结果，这也是美国政府乐于看到的。

“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们需要去证明我们是对的。”

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难以摆脱的原罪。国家总需要去重新叙述历史来完成正当性的建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盟是多方一步步尝试本国最大化利益的结果促成的，并非是很多人以为的出自一个种族或者文化上的浅薄原因。

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普遍感觉被极大羞辱。约旦的巴勒斯坦抵抗势力掀起内战。巴勒斯坦势力意识到常规的战争已不可能战胜以色列。他们受当时苏联主导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影响，转而平民发动恐怖袭击。这些行动受到了沙特以及之后的海湾国家的支持。美国对此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最终波及自身。埃及在 1971 年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但被以色列拒绝。以色列有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特别支持后，在所有领域都超高速发展，在战略上也愈加放肆。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主义从此成了主流势力。以色列战后直接非法占领西奈半岛。之后埃及渐渐转而与以色列交好，以重新换取西奈半岛的控制权。这种投敌行为使得埃及从此成了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进步的埃及的辐射，再加上伊朗70年代保守伊斯兰势力的革命。中东从此陷入了以宗教与极端势力主导的时代。也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中东的前身。

结语

许多地缘政治问题就好像两辆相向而行，注定要碰撞的列车。中文世界老生常谈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这样例子。斯巴达其实本意并不想与雅典发生冲突。但因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问题，两者冲突不可避免。很多人喜欢把巴以问题，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过度简单和抽象化了。当今巴以问题的困境是，两边都处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对这个问题的本身成因以及整个历史脉络却缺乏认识。其实从大的方向来说，这也是整个世界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们需要去证明我们是对的。”

当今世界建立在现代(Mordernity)以及二战后形成的秩序之下，但因为教育的误导以及缺失，普罗大众仅仅熟悉当今秩序的结果，却不了解其成因。

一点个人立场：以色列的锡安主义与哈马斯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都属于不应该属于当今世界的极端意识形态，锡安主义起源于民族主义，后面衍化成一种特殊的殖民主义（与传统的殖民主义不同，以色列人并不想要/需要阿拉伯人，只是打算占有土地）。极端伊斯兰主义更是反人类的危险意识形态，对中东自身造成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此外，在以色列人已经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好几代人的前提下，驱逐以色列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巴勒斯坦也必须放弃这个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宣称。最后，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势力必须被遏制，尽管短期来看可能还没那么轻松，若伊朗政局能在未来发生反转，以色列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许也会迎来拐点，这也会彻底改变巴以甚至中东的局面。我依旧觉得两国方案是可行的。相较阿拉伯人，让以色列人放弃耶路撒冷显得更为困难。巴勒斯坦以放弃耶路撒冷来取得和平及大量物资与援助，在我看来是比较理想也较容易达成的和平方案，当然这都需要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